

##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宋庆龄

许乃波

---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这个组织的成立是为了团结国际上进步和友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保盟”的任务是一方面让中国的国际朋友们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区的人民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物资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际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

当时“保盟”由国民党温和派宋子文当会长，左翼有廖承志，中间有邹韬奋、金仲华等，还有国际友人贝特兰、爱泼斯坦等，以及香港医务总监夫人海弥达·克拉克、香港大学诺曼·法朗士、陈君葆和我。由于宋庆龄在国内国际有极高的声望，国际友人的资助源源而来，“保盟”的对外宣传也引来了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柯棣华大夫。1938年成立“保盟”时，欧洲尚未爆发战争，但德、意、日已形成轴心国，英国在香港、东南亚已抽走兵力，香港只有2000名加拿大兵看守。但英、美政府已认识到爆发世界大战时，中国的持久战会削弱日军的势力，最终使日本到达不了目的地，即中东产油地。当时港督虽然让克拉克夫人参加“保盟”，但香港的绅士还没有被动员起来。我向香港大学校长史罗司建议，由港督以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的名义，在港督花园

设茶会，邀请宋庆龄为贵宾参加。参加茶会的都是香港政府高级官员和香港绅士，这样港督就为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在香港活动开了绿灯。紧接着，在香港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基金会时，所有香港主要绅士都来参加了。

1939年到1940年两年间，日军已占领中国华北及全部沿海城市，战线趋于稳定，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减轻。日本和汪精卫开始勾结，施展挑拨伎俩，许多地方的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的队伍发动了进攻。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对新四军进行袭击，扣押了军长叶挺，新四军政委项英被打死。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廖承志向宋庆龄汇报情况，宋庆龄立刻召集全体“保盟”委员开会。在讨论时，邹韬奋带头发言，他认为这是国民党企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停止抗日，重开内战，必须加以揭露。与会委员同意邹韬奋的分析。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贝特朗、爱泼斯坦都不在香港，宋庆龄便要我和廖承志起草对外宣传报告，第二天草稿就在全会上通过了。此后，“保盟”为皖南事变专发两期时事通讯，使国内外友好人士及海外华侨了解事变真相。周恩来同志也在重庆《新华日报》上抗议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径。很快，国际上各方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质问和抗议，国民党只得赶紧收场。不过，蒋介石却迫宋子文辞去“保盟”会长的职务。

国民党虽然停止对共产党的公开袭击，但是“保盟”收到国际的援助物资，经常在送往解放区的途中被国民党没收。香港沦陷后，送往广东东江游击队的物资被阻，要支援解放区就更加困难。幸亏后来美国在延安设了军事观察组，所以经常有车和飞机来往于重庆、延安、昆明。当时美国军队非常友好，对我们帮助很大。曾经有这么一次，美国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命令美军一架飞机改装舱门，为的是把一架X光机装进去，以便运往延安。

国际援助“保盟”大量捐款和物资，包括部队用的外科手

术用具和药品，给小孩吃的鱼肝油和奶粉，给前线战士的毛毯、手套和衣服等。这些专款和物资除了少数由捐助者指定对象外，大部分由宋庆龄全权做主，拨给最迫切需要捐助的抗日根据地。此外，“保盟”维持国际和平医院为八路军、新四军、老百姓提供医疗服务，支持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及边区保育院和托儿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李铁映也在这托儿所度过了童年的一部分时光。在重庆期间，“保盟”给国际和平医院的赞助至少有65万美元和1亿7千万法币。1942年5月在延安成立的洛杉矶托儿所是用“保盟”提供的美国洛杉矶援华团和爱国华侨的专款维持的。宋庆龄在1945年12月写的“保卫中国同盟声明”中，对在抗日战争中支援过我们的朋友们说：这种支援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

1941年12月，日本侵华战争爆发4年多后，又突然袭击珍珠港，并攻占香港。宋庆龄虽然安全转移到重庆，但是无法继续“保盟”工作，因为她本人也被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后来经国民党一些元老、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努力，才得以与外界联系，她被安置在新屯三号，记得有一次我去那里，见一个人站在门口，帽子压得低低的，走近一看，原来是斯诺！

1942年8月，部分“保盟”成员陆续从香港来到重庆，为“保盟”继续工作。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陈兵陕甘宁边区正酝酿第三次反共高潮，抗日统一战线面临分裂的危险。1943年宋庆龄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和《中国游击区》一文中说：“保盟”之所以把援助的重点放在抗日根据地，是因为“他们几乎全靠从敌人那里夺得的装备武装自己，牵制在华日军60%以上的部队，所以，对陕甘宁的封锁，特别是不让‘保盟’物资支援边区是不人道的。”公开信的呼吁影响了国际舆论，导致了“保盟”重新与国外援华机构和进步人士联系。

“保盟”在重庆还担负起赈灾的宣传和动员工作，救济河南、广东灾民，建立了两个国际组织，通过医务工作人员和英美

苏在重庆的外交和军事机构举行了戏剧义演，开展了一系列赈灾活动。1943年5月，宋庆龄以中华全国福利协会主席的身份，在我和其他几位“保盟”中央委员的努力筹备下组办了三场足球赛。国际友人和汇集在山城的优秀球队热烈响应，由“东平”、“沪星”、“英联”（英国使馆和军舰人员组成）、“韩青”（韩国在渝青年组成）四个球队参加比赛。宋庆龄和英国薛穆大使一起亲临开球，球赛结束时还给各球队赠送了奖旗和特制纪念章。这次球赛盛况空前。40多年后的今天，山城群众场面记忆犹新。球赛所得13万元全部捐给陕西宝鸡豫灾赈济委员会，通过那里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作组织灾民生产自救和迁徙之用。宋庆龄还考虑到河南死亡500万人的灾区中，有两个县是游击区，她把纽约美国人援华资助的5万美元全部给了当地中共领导的救济机构。

1943年7月，为赈济粤灾举办国际音乐义演，为广东灾民募得30万元。1943年4月为筹赈湘灾，举办了古今书画物品展览会及义演音乐会，两项收入共50万元，全部汇给湖南灾区。1944年9月，为帮助贫病作家、文化界人士，举办了文艺晚会，两天收入连同募得款项共100多万元，使在贫病挣扎中的文艺工作者得到物资援助和精神鼓舞。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毛泽东、周恩来来到重庆谈判。有一天，宋庆龄召集部分保盟委员到她家中，与毛泽东、周恩来亲切会见，会见时他俩感谢我们对他们的专款、物资支援。

七七事变后，大片国土沦陷，集中于沿海的很多工业毁于战火。当时动员人力在后方重建工业，发展生产，供应战时的军需民用，这是关系到能否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问题。同时，解决千百万流离失所、濒于饥饿的难民、伤兵的劳动就业，安定后方秩序，也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为此，1937年11月国际友人斯诺夫妇、路易·艾黎和胡愈之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

1938年8月5日，“工合”得到国民党政府同意正式成立。艾黎

任技术顾问，负责协会的组织工作，邓颖超、张治中等为理事，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任理事长，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

1939年1月，“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任名誉主席，英国主教何明华任主席，陈翰笙任执行秘书，斯诺、艾黎、宋子文等为委员，许乃波为技术顾问。同时，宋庆龄在国外建立了“工合促进委员会”，菲律宾华侨妇女救济协会等团体立刻筹款20余万元，并筹谋50万元作为“工合”基金。印尼一个华侨富商一次就向“工合”捐助10万元巨款。美国人为“工合”捐助了5000万元。从1938年到1945年，“工合”得贷款和专款共计1亿8千万元。

“工合”网罗人才，艰苦创业。它首先在西北，其次在东南、西南建立起来。全国各地的“工合”，1938年底仅有69个，1939年底发展到1284个。1942年达到1590个，月产值达2400多万元。在抗战期间，以西北“工合”为主，各地工合总共供应军毯超过500万条。“工合”种类繁多，从棉纺织到服装鞋帽，从日用杂货到食品加工，从文具印刷到医药化工，从五金机械到采矿交通，共50余种。本来以手工业为主的“工合”发展到半机械及机械化的工业合作社。

我于1939年带领美国机械工程师Vanness和新闻记者Sindan到江西赣州、瑞金等地，就是为发展机械合作社。香港大学学生当年曾派一个1940年电机系毕业生叶兰荪到江西“工合”服务。许多英国、美国、新西兰人以及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菲律宾、泰国等地的华侨青年工程技术人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同中国员工一道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夜以继日地为发展“工合”事业辛勤劳动。

“工合”成立时，部分经费由国民党政府拨付，到抗战快要结束时，国民党不但停止对“工合”的经费资助，而且屡次企图吞并“工合”的资金。宋庆龄请了一位审计师陈工明在桂林帮助“工合”管理审计帐目。当时，我介绍了一位叫沈瑶英的同志去帮助他。解放区和游击队的“工合”还开办了一些直接为八路

军、新四军、游击队斗争服务的工业，帮助制造手榴弹，修理卡车、弹药、枪械。深入敌后的“工合”能够在短时间内把机械拆卸装箱跟随抗日部队转移，又能在极短的时间安装好，进行生产，人们称它为“游击工业”。“工合”的产品及时供应军需民用，不但成为“反封锁”的有效手段，还对堵截敌货倾销，防止人力物力外流资敌，打击敌人“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和“工合国际委员会”，对组织国内抗日统一战线，维护西安事变后形成的国共合作，促使各国人民和政府承认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组成部分，从而得到他们的支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分配国际援助的医药物资方面，她把重点放在抗日根据地，对牵制在华日军60%以上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给予了极大帮助。这两个组织在后方重建工业，发展生产，供应战时军需民用，建立巩固的国防经济壁垒，支持长期抗战等方面，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单位：天津电气传动设计研究所)